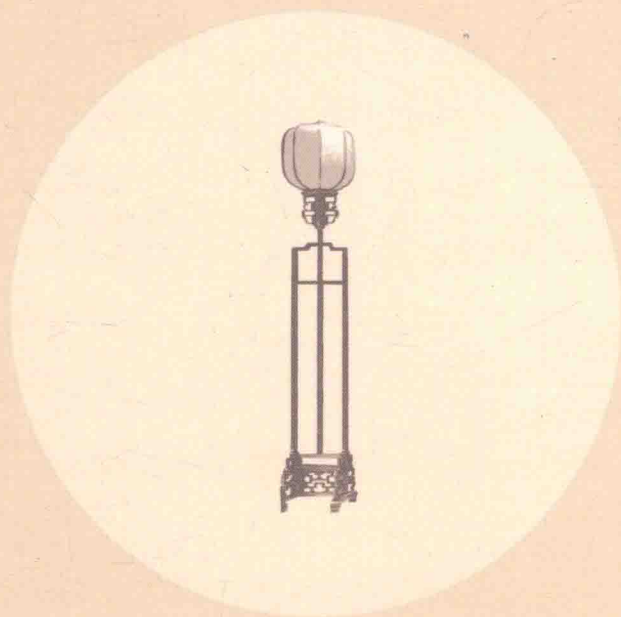


近代中国 女子教育论争史研究 (1895—1949)

Controversy History of Women's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1895-1949

王晓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中国 女子教育论争史研究 (1895—1949)

Controversy History of Women's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1895-1949

王晓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论争史研究: 1895 ~ 1949 / 王晓慧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 - 7 - 5161 - 5585 - 1

I. ①近… II. ①王… III. ①妇女教育—教育思想—思想史—
研究—中国—1895 ~ 1949 IV. ①G776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742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张 滢

责任校对 王心斐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99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91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受到以下项目资助：

湖北省2012年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
议题论争及其变迁研究》（立项号：2012173）

特此致谢！

序

一部富有教育史学想象力的著作

胡金平

晚清民国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女子学校教育比较快速地发展起来。

但是，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女子学校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直陷入到长期的争论当中。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比较详尽地勾勒、梳理和尽可能地还原那些女子学校教育论争场景并对之加以理论分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青年学者王晓慧的《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论争史研究（1895—1949）》一书即是试图探讨这一问题的学术努力。

我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教育史学想象力的学术著作。

我们知道，一般我们讲想象力的时候，主要是指对某一事物进行抽象思考的能力。从学术史来看，更为人们所熟知的，也许是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所提出的社会学想象力的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学的想象力主要是指社会学者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赋予了研究者顺畅地穿梭于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之中，并恰当地去理解这些关系的内在机理。相应地，另两个与想象力有关的概念是文学的想象力和历史学的想象力。前者，写作者可以天马行空地肆意穿越和描画，后者则要求研究者基于基本史实而展开的合理的和尽可能科学的想象。对于教育史学的想象力而言，它应该是教育史研究者在掌握有关教育现象的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在参与具体教育活动的个人、群体与宏观的历史变迁中穿梭的心智品质。要做到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论争史研究（1895—1949）》一书中，王晓慧需要尽可能成功地解决好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比较准确地呈现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论争的基本状况、过程和结果。

要想较好地把握和驾驭这一点,作者需要具备比较扎实的史料整理功底和分析能力,同时还需要具备较好的教育学的理论素养。应该说,从著作所呈现的精彩内容来看,王晓慧很好地处理了这一点。我们知道,一旦论争开端,在具体的论争内容方面必是千面万貌的,因此,如何准确地把握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论争的主要内容就显得非常重要。为此,王晓慧结合其对女子学校教育论争的史料的把握和对教育学所讨论的基本问题的理解,将女子学校教育论争的内容主要列为:女子要不要接受学校教育、女子学校教育的宗旨应该如何厘定、女子学校教育的基本形式如何设置以及女子学校教育的课程如何安排四个方面。

女子要不要接受学校教育是一个前置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可能谈及另外三个方面。为此,王晓慧以1895年前后的时点为核心,特别是以戊戌维新运动为关键历史事件点,对这一前置性问题的论争进行了学术扫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顽固守旧派基于传统的女子教育观念而坚决反对女子“抛头露面”地进入学校接受现代教育,而与之相对应的维新派则从强国保种的角度论述了女子为什么应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接受学校教育。

当前置性问题的论争解决后,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或者说女子学校教育的宗旨或目的就是首要问题。王晓慧从其所阅读的历史文献出发,以贤妻良母主义和男女平等主义的主要论争作为一条叙述的逻辑暗线,将关于女子学校教育问题的论争分为几个主要阶段,并以历史时间作为逻辑明线,叙述中呈现了一副像钟摆一样的论争样态图,其间,贤妻良母主义的反复十分明显。从戊戌维新至新中国成立前,关于女子学校教育宗旨的论争,主要经历了:贤妻良母主义VS女子国民——贤妻良母主义VS男女平等主义——母性主义与妇女回家论VS男女平等主义与妇女进入职场等这些论争过程。

在教育宗旨论争的大背景下,衍生而来的问题是,女子学校教育在形式上应该如何设置,是让其单独在女子学校接受教育呢?还是让其与男生一样在同一个学校甚至同一个班级接受教育?王晓慧讨论这一问题的巧妙之处在于,除了展现基本的论争情况外,她还从所搜集的史料出发,在女子学校教育的大学阶段和中学阶段各选了一个典型个案进行深度描述和解读。在大学教育阶段的男女是否应该同学的论争部分,王晓慧以邓春兰上书蔡元培为典型个案,全方位地揭示了个人是如何将自我解放嵌入到宏大

的解放话语的叙事和实践中的；而以清华学堂的男女同学论争为个案，则深刻展现了置于整个社会大场域之下的清华学堂内部是如何讨论男女平问题的。

与男女同学的论争一样，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内容亦服膺于关于女子教育宗旨的讨论。王晓慧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向我们展示了这一问题的论争状况。从她的梳理来看，我们会发现，持贤妻良母主义者，更倾向于主张女子接受教育的内容主要限于家事教育，也即满足作为一位贤妻或一位良母在家庭内部能够相夫教子、宜家善种的基本技能。但是，作为反对群体，持男女平等主义者，则更倾向于主张女子接受职业教育，培养女子的职业技能，从而能够走出家庭迈向职场社会。

比较完整和生动地揭示完当时女子学校教育论争的基本状况、过程和结果后，王晓慧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从理论的高度对之加以解释，而这则更需要有教育史学的想象力了。

王晓慧在梳理和扫描女子学校教育论争的过程中发现，几乎每一阶段的论争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分不开。特别是，她发现，在现在的一般人看来，女子教育并非是引起注意的领域，但是，在近代中国，却引起了许多人士的关注，慈禧太后、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蔡元培、胡适、李大钊、蒋介石、汤化龙、周恩来、邓颖超等等，都给予了非常的关注。这表明，政治人物或与政治接近的人物都很关注女子教育的论争问题。他们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也表明，女子学校教育的论争远非单纯的教育问题那么简单。正是基于这些思考，王晓慧在著作中运用了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对之加以十分精彩的分析。在王晓慧看来，综合既有研究如国外的杜赞奇、蒂利和国内的张静、徐勇等人关于国家政权建设的阐述和应用，国家政权建设的重点是要建立具有合法性的且行之有效的中央政治单位，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即一方面应具有现代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又应该在治理层面具有合法性。这一理论假设的反面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没有完成，也即在中央集权的角度不具备强有力的国家能力以及在文化层面不具备合法性，那么，就很难成功地构建现代制度体系，更别说要现代制度付诸实践之中。

在这一具有教育史学想象力的脉络中，王晓慧认为，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论争，表面上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从更深层次来看，则是十足的政治问题。也即是说，在相对微观的教育场域与宏观的政治场域之间，作

为研究者,应具备一种穿梭于其间的心智能力。教育不仅在于培养人才,还在于,教育本身即是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手段之一。从最早的顽固守旧派反对女子接受学校教育开始,到最终在男女平等主义背景下,女子不但可以接受学校教育,且完全能与男子同等接受现代教育止,其背后都反映了政治的作用所在。论争的困境在于,任何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构建过程中,总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维新派从君主立宪的角度出发,其所需要的女子仅是近可宜家 and 远可善种的能够强国保种的女子,而这种女子的获得则依赖于她们接受现代教育的可能以及成功。革命派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显然认为女子学校教育仅停留在强国保种的角度是不够的,国家欲要强大,作为国民一半的女子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权利的解放就无疑是显得至关重要的。其后诸种论争,尽管形式上和概念上的陈述和表现不一样,但它们本质上却均是这一基本逻辑的产物。

不仅如此,借用教育史学想象力的穿越,王晓慧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看似十分渺小的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论争问题,其实除了与中国自身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有关外,它还毫无疑问地属于全球化过程中的典型问题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期,国际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但很快面临着就业难等系列问题,中国亦同样无法例外。中国的女子教育在早期能够顺应全球形势的发展,但在后期,随着全球就业市场的紧张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女子就业空间日益狭窄起来。在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处理高素质的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女子就业问题与国内革命发展的形势问题之间就形成了强大张力。这种问题的出现,本质上并非中国所独有,我们从王晓慧的研究中,亦可以看到,全球场域中的德国、意大利均面临此种严峻问题。而这一宏大历史变迁,在近代女子教育论争方面则表现在对教育宗旨与教育内容设置上的讨论,所谓“母性主义”、“妇女回家论”、家事教育的强调本质上都与此高度关联。

从问题的化解方面来说,我们发现,在王晓慧富有教育史学想象力的背景下,女子是否应该接受教育、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如何接受教育以及教育的内容是什么都与当时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进度和过程息息相关。简而言之,近代中国的女子学校教育,作为运行的现代事物之一,它同样需要全方位的现代制度体系和人们的现代观念相配套方可良性运行,反之,封建的或落后的政治基础,显然无法支撑现代教育制度体系的有效运

行。也正是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后，所谓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位的构建和男女平等的现代男女地位的认知均取得了几千年来的实质性进展。因此，现代的国家政权建设的成功使得现代的女子学校教育制度的构建和实践得以成功成为可能。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我认为，王晓慧的著作毫无疑问算得上是一部具有教育史学想象力的著作。至于其他存在的缺陷抑或优点，均在所难免，此处，我也不必多述，就留给读者评判吧。

2006年王晓慧跟随我攻读教育学的硕士学位，主攻中国教育史方向，2009年以后，又继续跟随我攻读教育学的博士学位，其兴趣点主要着力于晚清民国时期我国的女子教育问题。无论是求学期间还是毕业以后，她的刻苦和努力，我一直是目睹的，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没有她扎实的刻苦和努力，我想，她的著作也很难达到目前的高度。

对王晓慧来说，毕业后，尽管她面临结婚、生子等一系列世俗事务所带来的惊喜同时抑或干扰，但她对学术的追求和热爱仍一以继之，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学术之路上，从不敢懈怠。这部书稿正是王晓慧从不懈怠的产物，愿她以此为起点，继续飞翔。

是为序。

2015年3月29日 於南京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2)
第二节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研究	(5)
第二章 前提讨论: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应然性论争	(11)
第一节 立论:女子应该接受学校教育	(12)
第二节 反驳:女子不应该接受学校教育	(31)
第三节 结果:女子教育在论争中进入制度	(41)
第三章 教育宗旨:女子应接受何种教育的论争	(44)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宗旨论争	(45)
第二节 五四时期女子教育宗旨的论争	(65)
第三节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女子教育宗旨的再论争	(81)
第四章 教育形式:男女应否同学的论争	(109)
第一节 “男女同学”论争的历史背景	(110)
第二节 邓春兰的上书与大学男女同学的论争	(113)
第三节 中学应否男女同学的论争	(127)
第四节 “男女同学”反复论争的简要分析	(154)
第五章 教育内容:家事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论争	(159)
第一节 清末民初:家事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论争初露	(160)

第二节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家事教育与职业教育 论争的深化	(175)
第三节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家事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再论争	(189)
第六章	论争解释: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分析	(199)
第一节	国家政权建设理论	(200)
第二节	议题论争与国家政权建设	(207)
第七章	结语	(236)
第一节	基本结论	(236)
第二节	1949 年以来的女子教育	(239)
参考文献		(242)
致谢		(267)

第一章

导 论

本书是一项对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①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议题的论争及其变迁的研究。

所谓“议题”，在本书中相当于英文词“issue”，意指就某一社会事实而开展的有争议的可供讨论的系列问题。因此，“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议题”就是指在中国近代史上围绕女子教育这一范畴所展开的一系列有争议的可供讨论的问题谱系。在这一问题谱系中，近代中国女子是否应该接受教育、应该接受何种教育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教育是本书要叙述与讨论的核心和主要议题。本书旨在通过考察时人围绕这些议题所展开的系列论争的历史样态以及这些议题本身在论争中的变迁过程，来揭示男性与女性、女性与民族—国家^②、民族—国家与世界等三大关系主体之间通过教育这一层面所表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动态的历史关系。在此基础上，本书试图讨论近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是如何映射到女子教育的议题内部以及如何促使这些议题陷入种种论争当中的，从而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小历史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大历史联系起来。

①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结束。本书意义上的“近代”，则是指1895年甲午海战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如无特殊说明，本书中的“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就是指“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

②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并不完全等同于目前学界普遍流行的“单一民族国家”范式之内涵。其在近代中国有特定含义。这一说法的提出，是与久已流传的“天下”概念相对，认为，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必须要对内团结凝聚民族精神，对外一致抵御外侮，由此而形成统一的独立的民族，进而成为“民族国家”，以此来否决之前的“王朝国家”。笔者以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国家”的建构从清末新政就已然萌芽，之后包括中华民国成立，革命党人试图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以统领中华民族，以及特别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一系列政策，都是为了建构“民族国家”。与此同时，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民族—国家”成为蒋氏政权企图获得政治认同感和决策合理性的理念性口号。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840年后的晚清，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受1895年甲午海战惨败的直接刺激，精英知识分子们开始痛定思痛，对晚清若干次战败、政府的无能以及国家的贫穷落后进行深层究因，并发动了“戊戌变法”。维新派认为，中国成为“东亚病夫”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女性“无学无教”，没有起到强国保种的作用，如梁启超谓“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①进而要求废缠足，兴女学，教育女性如何为妻为母，近代中国的女子教育亦因此而滥觞。

然而，对女子应该接受教育这一问题并没有众口一词。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围绕着“女子是否应接受教育”以及“女子该接受何种教育”的核心议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曾进行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论争。论争由维新派发起，却遭到了保守人士的质疑，反对之声立即遍起。而后，维新派很快受到传教士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声援，并以三比一的态势对保守派进行猛烈的反攻。虽然提倡兴女学的各派立场不同，各自的出发点亦不相同，但在与保守派的论争中，暂时取得了胜利。维新派之所以把女子教育提上议事日程，一方面基于“强国保种、女学兴国”的考虑，另一方面，鉴于女子向来为保守派所忽视，而女子教育则更为他们所不屑一顾，因此兴女学也就成为维新派向保守派宣战的武器之一。当然，与此相应，保守派也抨击维新派对女子教育的提倡以及对教会女学毫无保留的接受与学习，指出西方教育不适合中国女子，以及开展女子学校教育的荒谬性。这一场论争以1907年女子教育被写进清末学制中暂告结束。这一结果直接促进了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兴起及高潮的到来，一时间，女子学校渐有设立，中国女性由此而进入正规学校教育阶段。

如果将这场论争放入当时中国国内政治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中，我们会发现，正是这场论争，引发了女子教育领域内接下来的另外几场更大规模的也更为具体化的论争，即伴随着这场论争一同进行、并且还一直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女子应该接受何种教育”的教育宗旨论争，以及发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生于20世纪20年代乃至30年代的“女子是否应该与男子同学”之争和“女子教育的内容重在家事教育还是职业教育”之争，这几场论争比之前的论争涉及面更广，论争也更有深度，参与受众也更加广泛，特别是广大普通民众和女性也积极参与到这几场论争之中。一时间，有关女子教育的议题在诸多报纸杂志上大量、广泛并长期出现，一些杂志甚至专门登出了“女子教育”专栏以及开办了“女子教育”相关议题的专号。这几场论争使得初期出现的女子独立学校逐渐转换为男女同学的学校，而众多原本只录取男子的学校也开始招收女学生，由此，女子获得了与男子进入同一所学校就读的资格；更使得专门针对女子开设的家事教育逐渐转换为广泛的职业教育，为女子进入社会谋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然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女子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近三十年之后，又一股女子教育需要“返古”的浪潮反扑而来。尽管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正蓬勃发展，但因为此前教育制度的不完善，女子教育暴露出诸多弊端且迫于战时形势无法得到立即解决，于是，其又开始遭到了时人的关注与论争，而论争的焦点最终又回归到“女子教育到底有无用处”以及“女子教育的成效何在”这些问题原点，而最终又以“女子应接受何种教育”的主旨议题论争为体现形式，多数论者又开始质疑“女子是否有必要接受学校教育”，并提出“女子回归家庭无须受教育”之呼唤。于是，各方又开始了激烈的论争。

章开沅曾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教育领域的新旧之争，其激烈程度并不次于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而其影响覆盖面甚至大于后两个领域。”^①而笔者以为，即使是在教育领域内的新旧之争，女子教育方面的激烈程度也并不次于教育领域内其他论争，且更为激烈的是体现在女子教育目标、形式以及内容上的新旧之争。可以作为例证的是，尽管当时女子问题一直都是社会舆论的焦点，各报纸杂志有关女子解放的议题也层出不穷，内容包括废缠足、争取女子参政权、经济权、婚姻自主权等其他诸多方面，但是从学术界、知识界以及普通民众的反应来看，在以上几个领域内的议题设置与论争远不及在教育领域内这几场争论来得更热烈、更持久。这些被论争的议题可以被视为现代女子教育在经历启蒙的过程中与中

^① 章开沅：《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丛书》总序，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国传统女子教育在思想、观念、观点交锋上的若干个交叉点，也可以说是西方女性主义或称女权主义、自由主义与中国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相遇的一个结合点。当然，论争各方无所谓输赢，无所谓结局，因为往往取得的都只是暂时胜利。然而，正是在这些议题的论争中，女子教育在延续中发展，在发展中前进。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几场大论争，女子教育的政策制定者——上层政府官员、女子教育的理念提倡者——精英知识分子（包括男性与女性）、女子教育的学校实践者——各男女教育者以及女子教育的具体行动者们——接受教育的女子群体，才能在辩论中各自审时度势，摸索自己的立足点，摘取论争各方有用的观点，从而为己所用，并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最终发展。

也因此，对这几场关于女子教育议题的论争，很难用传统的、单向的理论来定性，也难以完全用原来的治史方式来进行考察，而更需要用一种动态（如议题本身的变迁）、多元的眼光（如来自男性、女性以及民族—国家各自的期待）来考察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通过这几场大的论争，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完成了自身的实践转型，成功地从零星的女子家庭教育转为系统的女子学校教育，并策略性地吸收了论争双方甚至多方的有关女子教育如何开展的观点，同时也有技巧地吸收到了社会的舆论目光与文化导向，从而完成建构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面，在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交叉融合过程中，中国女性群体开始崛起，出现了一批时人所称的“新女性”，对于中国传统女性阶层社会地位的改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女性”群体用事实证明了女性并非“第二性”，并同时和进步男性一起，成为建构民族—国家的革命与建设的主力军。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中国社会有关女子教育的这几场论争，实际上仅仅是众多社会论争中的冰山一角，是20世纪中国社会大裂变过程中一个局部的场景。然而，透过这一局部景象，我们可以间接地透视西方女性主义、自由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后，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抑或合称为民族—国家主义）交互构建与形塑的历程。此外，即使是考察这几十年来相继出现的有关女子教育的各种言论，都会给今天的女子教育带来相当大的启发，更何况，我们是可以以今人的目光来重新审视（但不是苛求）那一段历史的，相信会有更加不一样的感触。并且，从另一个层面来说，纵观整个女子教育议题的变迁，这些论争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无须论辩、不言自明的某些议题，却成为时人论争中见仁见智的焦

点问题。这也恰好印证了舒新城所说的：“思想原是人类心意中的一种意识作用，这种作用虽然为人所同具、但因所意识的对象或意识的主体不同，其结果常不一致，甚至于互成反比。”^① 因为近代关于女子教育发展的观念论争，正是体现了这一观点。“如果只是简单地把这些变化看作一系列失误，以充满艰辛、未臻完美的方式一个接一个地相互矫正，那么，这一整套历史也就不具有核心的研究价值了。”^② 我们也应当看到，对这些女子教育议题的论争，在当时的现实中都有着具体的体现，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什么随意的产物。“如果说其中之一未能延续下来，那并不是因为它只是人的偏差的产物，而是因为它是某些相互作用的特定社会力量的结果。如果它已经有所改变，那正是因为社会本身已经有所改变。”^③ 因此，我们将基于直接的经验认识到，不存在什么恒常不变的教育形式，昨日的教育形式不能搬到今天。一方面，各个体系都始终处在变化当中，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环节上，这些持续的变化都关系到一个单一的、固定的和具有限定作用的参照点，也就是在相关环节上的社会条件（至少当这些变化还属于正常的时候是这样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客观地来评价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议题论争中的各种观点及其变迁历程。

第二节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表现之一就是中国女子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由于中国女性在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女性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着激烈变化，故近代女子教育向来是教育史界研究的热点题域，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关于近代女子教育的研究，国内外都有相关的专著和论文。这些著作、论文大都围绕着本书所要叙述和讨论的论争中的某个热点问题或某一阶段性的问题进行论述。然而，严格来讲，高质量的著述与论文却并不多见，既有研究给笔者一个最直观的印象

①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 [法]爱弥儿·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③ 同上书，第13页。

就是多为述而不论,至于用现代化理论^①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迁,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新课题,但是将其运用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研究领域里而产生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

对1895年以来女子教育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历史时段。第一个时段是从1919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一阶段相对来说要显得略微粗略。第二个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三十余年,成果相对突出。

1919—1937年既是近代女子教育的蓬勃发展时期,也是学界对其进行研究的起步阶段。在这之前的30年,伴随着国家、民族的存亡危机,女性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相互碰撞与作用,女性问题成了当时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女子教育问题则又是整个女性问题研究的一部分。其中,对“女子是否应该接受学校教育”,“女子受教育的目标是否是‘贤母良妻’^②”,以及“男女该不该同学”等议题就已被时人探讨过。192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了由梅生编辑的《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③,内容涉及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女性的教育问题、生活问题、社交问题和家庭问题等,较深入地探讨了“男女是否应该同学”、“女子职业教育该如何开展”、“女子家庭问题”等一系列议题。随后,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姜琦的《女子教育之问题及现状》,收录了当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些作者如贾丰臻、陈衡哲、陈伯行等人的有关女子教育的论文,对其时的“男女同学问题”以及“女子职业教育问题”等

① 田正平先生认为:“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理论,它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人类文化学众多的学科。概括地说,现代化理论就是运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综合探讨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理论,是探讨非西方后进国家实现过渡的具体历史过程。尽管迄今为止这种起源于欧洲而在美国得到长足发展的社会科学新理论,还很难说形成了完整的、成熟的体系,但是,它所揭示的研究方法,它所强调的对社会发展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总体思路,无疑是富于创新精神和启迪意义的。”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总前言》,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② “贤母良妻”在形式上与“贤妻良母,良母贤妻,良妻贤母”这几个词语相似,但是尽管其排列组合的顺序不同,这几个词要表达的含义是类同的。对于这几个词的出现以及如何搭配,学界众说纷纭,以至于这一用语实际上在各位学者的研究框架中,引用比较混乱。根据笔者对于近代资料的查阅,“贤母良妻”一词流行于20世纪头20年,可能来源于其时由日本流入进来的“良妻贤母”主义。而大约从20年代中期开始,“贤妻良母”这一词便开始流行起来了。为了便于行文,笔者在文中不做过于细致的区分,因而将“贤妻良母”和“贤母良妻”交叉混合使用。又因其时这一说法明显带有一种主义色彩,故而,有时亦称为“贤母良妻”主义。

③ 梅生编:《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新文化书社1923年版。